# 白石老人自述（节选）

齐白石(1864—1957)，湖南湘潭人。国画大师，擅作花鸟虫鱼，亦工山水、人物。1953年被文化部授予人民杰出艺术家称号。

## 从雕花匠到画匠(1878—1889)

光绪四年(戊寅，1878)，我十六岁。祖母因为大器作木匠，非但要用很大力气，有时还要爬高上房，怕我干不了。母亲也顾虑到，万一手艺没曾学成，先弄出了一身的病来。她们跟父亲商量，想叫我换一行别的手艺，照顾我的身体，能够轻松点的才好。我把愿意去学小器作的意思，说了出来，他们都认为可以，就由父亲打听得有位雕花木匠，名叫周之美的，要领个徒弟。这是好机会，托人去说，一说就成功了。我辞了齐师傅，到周师傅那边去学手艺。

这位周师傅，住在周家洞，离我们家，也不太远，那年他三十八岁。他的雕花手艺，在白石铺一带，是很出名的，他用平刀法，雕刻人物，尤其是他的绝技。我跟着他学，他肯耐心地教。说也奇怪，我们师徒二人，真是有缘，处得非常之好。我很佩服他的本领，又喜欢这门手艺，学得很有兴味。他说我聪明，肯用心，觉得我这个徒弟，比任何人都可爱。他没有儿子，简直是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看待。他又常常对人说："我这个徒弟，学成了手艺，一定是我

们这一行的能手，我做了一辈子的工，将来面子上沾着些光彩，就靠在他的身上啦！”人家听了他的话，都说周师傅名下有个有出息的好徒弟。后来我出师后，人家都很看得起，这是我师傅提拔我的一番好意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。

光绪五年(己卯,1879)，我十七岁。六年（庚辰，1880)我十八岁。七年(辛巳,1881)，我十九岁。照我们小器作的行规，学徒期是三年零一节。我因为在学徒期中，生了一场大病，耽误了不少日子，所以到十九岁的下半年，才满期出师。我生这场大病，是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,病得非常危险,又吐过几口血,只剩得一口气了。祖母和我父亲，急得没了主意直打转。我母亲恰巧生了我弟纯隽，号叫佑五，正在产期，也急得东西都咽不下口。我妻陈春君，嘴里不好意思说，背地里淌了不少的眼泪。后来请到了一位姓张的大夫,一剂‘以寒伏火’的药,吃了下去,立刻就见了效,连服几剂调理的药，病就好了。病好之后，仍到周师傅处学手艺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，学会了师傅的平刀法，又琢磨着改进了圆刀法，师傅看我手艺学得很不错，许我出师了。出师是一桩喜事，家里的人都很高兴,祖母跟父亲母亲商量好,拣了一个好日子,请了几桌客,我和陈春君‘圆房’了,从此,我和她才是正式的夫妻。那年我是十九岁，春君是二十岁。

我出师后，仍是跟着周师傅出外做活。雕花工是计件论工的，必须完成了这一件，才能去做那一件。周师傅的好手艺，白石铺附近一百来里的范围内,是没有人不知道的,因此,我的名字,也跟着他,人人都知道了。人家都称我‘芝木匠’,当着面,客气些,叫我“芝师傅”。我因家里光景不好,挣到的钱,一个都不敢用掉,完工回了家,就全部交给我母亲。母亲常常笑着说‘:阿芝能挣钱了,钱虽不多,总比空手好得多。”

那时，我们师徒常去的地方，是陈家垅胡家和竹冲黎家。胡黎两姓，都是有钱的财主人家，他们家里有了婚嫁的事情，男家做床

橱，女家做妆奁，件数做得很多，都是由我们师徒去做的。有时师傅不去，就由我一人单独去了。还有我的本家齐伯常的家里，我也是常去的。伯常名叫敦元，是湘潭的一位绅士。我到他家，总在他们稻谷仓前做活，和伯常的儿子公甫相识。论岁数，公甫比我小得多，可是我们很谈得来，成了知己朋友。后来我给他画了一张《秋姜馆填词图》，题了三首诗，其中一首道：

稻粱仓外见君小，草莽声中并我衰，
放下斧斤作知己，前身应作蠹鱼来。

就是记的这件事。

那时雕花匠所雕的花样，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。祖师传下来的一种花篮形式，更是陈陈相因，人家看得很熟。雕的人物，也无非是些麒麟送子、状元及第等一类东西。我以为这些老一辈的玩艺儿，雕来雕去，雕个没完，终究人要看得腻烦的。我就想法换个样子，在花篮上面，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李杏等果子，或牡丹芍药梅兰竹菊等花木。人物从绣像小说的插图里，勾摹出来，都是些历史故事。还搬用平日常画的飞禽走兽，草木虫鱼，加些布景，构成图稿。我运用脑子里所想得到的，造出许多新的花样，雕成之后，果然人都夸奖说好。我高兴极了，益发的大胆创造起来。

那时，我刚出师不久，跟着师傅东跑西转，倒也一天没有闲过。只因年纪还轻，名声不大，挣的钱也就不会太多。家里的光景，比较头二年，略为好些，但因历年积叠的亏空，短时间还弥补不上，仍显得很不宽裕。我妻陈春君一面在家料理家务，一面又在屋边空地，亲手种了许多蔬菜，天天提了木桶，到井边汲水。有时肚子饿得难受，没有东西可吃，就喝点水，算是搪搪饥肠。娘家来人问她："生活得怎样？"她总是说："很好！"不肯露出丝毫穷相。她真是一个挺得起脊梁顾得住面子的人！可是我们家的实情，瞒不过隔壁的邻居们，有一个惯于挑拔是非的邻居女人，曾对春君说过："何必在此吃辛吃苦，凭你这样一个人，还找不到有钱的丈夫！"春君笑着

说“有钱的人,会要有夫之妇 我只知命该如此,你也不必为我妄想！”春君就是这样甘熬穷受苦，没有一点怨言的。

光绪八年(壬午,1882),我二十岁。仍是肩上背了个木箱,箱里装着雕花匠应用的全套工具，跟着师傅，出去做活。在一个主顾家中,无意间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《芥子园画谱》,五彩套印,初二三集，可惜中间短了一本。虽是残缺不全，但从第一笔画起，直到画成全幅，逐步指说，非常切合实用。我仔细看了一遍，才觉着我以前画的东西，实在要不得，画人物，不是头大了，就是脚长了,画花草,不是花肥了,就是叶瘦了,较起真来,似乎都有点小毛病,有了这部画谱,好像是捡到了一件宝贝,就想从头学起,临它个几十遍。转念又想 书是别人的,不能久借不还,买新的,湘潭没处买,长沙也许有,价码可不知道,怕有也买不起。只有先借到手,用早年勾影雷公像的方法，先勾影下来，再仔细琢磨。

想准了主意，就向主顾家借了来，跟母亲商量，在我挣来的工资里，匀出些钱，买了点薄竹纸和颜料毛笔，在晚上收工回家的时候,用松油柴火为灯,一幅一幅的勾影。足足画了半年,把一部《芥子园画谱》,除了残缺的一本以外,都勾影完了,订成了十六本。从此,我做雕花木活,就用《芥子园画谱》作根据,花样既推陈出新,不是死板板的老一套，画也合乎规格，没有不相匀称的毛病了。

我雕花得来的工资，贴补家用，还是微薄得很。家里缺米少柴的，时常闹着穷。我母亲为了开门七件事，竟天的愁眉不展。祖母宁可自己饿着肚子，留了东西给我吃。我是个长子，又是出了师学过手艺的人，不另想想办法，实在看不下去。只得在晚上闲暇之时，匀出功夫，凭我一双手，做些小巧玲珑的玩艺儿，第二天一清早，送到白石铺街上的杂货店里，许了他们一点利益，托他们替我代卖。我常做的，是一种能装旱烟也能装水烟的烟盒子，用牛角磨光了，配着能活动开关的盖子，用起来很方便，买的人倒也不少。大概两三个晚上，我能做成一个，除了给杂货店掌柜二成的经手费

以外，每个我还能得到一斗多米的钱。那时，乡里流行的，旱烟吸叶子烟,水烟吸条丝烟。我旱烟水烟,都学会吸了,而吸得有了瘾。我卖掉了自己做的牛角烟盒子，吸烟的钱，就有了着落啦，连烧料烟嘴的旱烟管,和吸水烟用的铜烟袋,都赚了出来,剩余的钱,给了我母亲，多少济一些急，但是还救不了根本的穷，不过聊胜于无而已。

光绪九年(癸未,1883),我二十一岁。那年,春君怀了孕,怀的是头一胎。恰巧家里缺柴烧，我们星斗塘老屋，后面是靠着紫云山,她拿了把厨刀,跑到山上去砍松枝。她这时,快要生产了,拖着笨重的身子，上山很费力，就用两手在地上爬着走，总算把柴砍得了,拿回来烧。到了 9 月，生了个女孩，这是我们的长女，取名菊如，后来嫁给了姓邓的女婿。

我在早先上山砍柴时候，交上一个朋友，名叫左仁满，是白石铺胡家冲的人，离我们家很近。他岁数跟我差不多，我学做木匠那年，他也从师学做蔑匠手艺，他出师比我早几个月。现在我们都长大了,他也娶了老婆,有了孩子,我们歇工回来,仍是常常见面,交情倒越交越深。他学成了一手编竹器的好手艺，家庭负担比较轻，生活上比我略微好一些。他是喜欢吹吹弹弹的，能拉胡琴，能吹笛子，能弹琵琶，能打板鼓。还会唱几句花鼓戏，几段小曲儿。我们常在一起玩，他吹弹拉唱，我就画画写字。有时他叫我教他画画，他也教我弹唱。乡里有钱的人，常往城里跑，去找玩儿的。我们是穷孩子出身，闲暇时候，只能做这样不花钱的消遣。我后来喜欢听戏，也会唱几支小曲，都是那时候受了左仁满的影响。

光绪十年(甲申,1884),我二十二岁。十一年(乙酉,1885),我二十三岁。十二年（丙戌,1886），我二十四岁。十三年（丁亥,1887）,我二十五岁。十四年（戊子,1888),我二十六岁。这五年,我仍是做着雕花活为生，有时也还做些烟盒子一类的东西。我自从有了一部自己勾影出来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翻来覆去的临摹了好

几遍，画稿积存了不少。乡里熟识的人知道我会画，常常拿了纸，到我家来请我画。在雕花的主顾家里，雕花活做完以后，也有留着我不放我走,请我画的,凡是请我画的,多少都有点报酬,送钱的也有，送礼物的也有。我画画的名声，跟做雕花活的名声，一样的在白石铺传开了去。人家提到了芝木匠，都说是画得挺不错。

我平日常说：“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，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。”我早先画过雷公像,那是小孩子的淘气,闹着玩的,知道了雷公是虚造出来的，就此不画了。但是我画人物，却喜欢画古装，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，我就照它画了出来。

我的画在乡里出了点名，来请我画的，大部分是神像功对，每一堂功对，少则四幅，多的有到二十幅的。画的是玉皇、老君、财神、火神、灶君、阎王、龙王、灵官、雷公、电母、雨师、风伯、牛头、马面和四大金刚、哼哈二将之类，这些位神仙圣佛，谁都没见过他们的本来面目。我原是不喜欢画的，因为画成了一幅，他们送我一千来个钱，合银元块把钱，在那时的价码，不算少了，我为了挣钱吃饭，又却不过乡亲们的面子，只好答应下来，以意为之。有的画成一团和气,有的画成满脸煞气。和气好画,可以采用《芥子园》的笔法,煞气可麻烦了,决不能都画成雷公似的,只得在熟识的人中间，挑选几位生有异相的人，作为蓝本，画成以后，自己看着，也觉可笑。我在枫林亭上学的时候，有几个同学，生得怪头怪脑的，现在虽说都已长大了，面貌究竟改变不了多少，我就不问他们同意不同意，偷偷地都把他们画上去了。

我在二十六岁那年的正月，我母亲生了我六弟纯楚，号叫宝林。我们家乡,把最小的叫做‘满’,纯楚是我最小的兄弟,我就叫他满弟。我母亲一共生我弟兄六人，又生了我三个妹妹，我们家，连同我祖母,我父亲母亲,和春君,我的长女菊如,老老小小,十四口人了。父亲同我二弟纯松下田耕作，我在外边做工，三弟纯藻在一所道士观里给人家烧煮茶饭，别的弟妹，大一些的，也牧牛的牧

牛，砍柴的砍柴，倒是没有一个闲着的。祖母已是七十七岁的人，只能在家里看看孩子，做些轻微的事情。春君整天忙着家务，忙里偷闲，养了一群鸡鸭，又种了许多瓜豆蔬菜，有时还帮着我母亲纺纱织布。她夏天纺纱，总是在葡萄架下阴凉的地方，我有时回家，也喜欢在那里写字画画，听了她纺纱的声音，觉得聒耳可厌，后来我常常远游他乡，老来回忆，想听这种声音，已是不可再得。因此我前几年写过一首诗道：

山妻笑我负平生，世乱身衰重远行。
年少厌闻难再得，葡萄阴下纺纱声。

我母亲纺纱织布，向来是一刻不闲。尤其使她为难的，是全家的生活重担,都由她双肩挑着,天天移东补西,调排用度,把这点微薄的收入，糊住十四张嗷嗷待哺的嘴，真够她累心累力的。

三弟纯藻，也是为了糊住自己的嘴，多少还想挣些钱来，贴补家用，急于出外做工。他托了一位远房本家，名叫齐铁珊的，荐到一所道士观中，给他们煮饭打杂。齐铁珊是齐伯常的弟弟，我的好朋友齐公甫的叔叔，他那时正同几个朋友，在道士观内读书。我因为三弟的缘故，常到道士观去闲聊，和铁珊谈得很投机。

我画神像功对，铁珊是知道的，每次见了我面，总是先问我：“最近又画了多少 画的是什么 ?”我做雕花活,他倒不十分关心，他好像专门关心我的画。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：“萧芗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，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！画人像，总比画神像好一些。”

我也素知这位萧芗陔的大名，只是没有会见过，听了铁珊这么一说，我倒动了心啦。不多几天，萧芗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。我画了一幅李铁拐像,送给他看,并托铁珊、公甫叔侄俩,代我去说，愿意拜他为师。居然一说就合，等他完工回去，我就到他家去,正式拜师。这位萧师傅,名叫传鑫,芗陔是他的号,住在朱亭花钿，离我们家有一百来里地，相当的远。他是纸扎匠出身，自己发

奋用功,经书读得烂熟,也会做诗,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,又会画山水人物。他把拿手本领，都教给了我，我得他的益处不少。他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和我相识，也是个画像名手，家住在小花石。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，他的得意手法，都端给我看，指点得很明白。我对于文少可，也很佩服，只是没有拜他为师。我认识了他们二位,画像这一项,就算有了门径了。

那年冬天，我到赖家垅衙里去做雕花活。赖家垅离我们家，有四十多里地，路程不算近，晚上就住在主顾家里。赖家垅在佛祖岭的山脚下,那边住的人家,都是姓赖的,衙里是我们家乡的土话,就是聚族而居的意思。我每到晚上，照例要画画的，赖家的灯火，比我家里的松油柴火，光亮得多，我就着灯盏画了几幅花鸟，给赖家的人看见了,都说:芝师傅不是光会画神像功对的,花鸟也画得生动得很。”于是就有人来请我给他女人画鞋头上的花样，预备画好了去绣的。又有人说：“我们请寿三爷画个帐檐，往往等了一年半载，还没曾画出来，何不把我们的竹布取回来，就请芝师傅画画呢?”我光知道我们杏子坞有个绅士,名叫马迪轩,号叫少开,他的连襟姓胡，人家都称他寿三爷，听说是竹冲韶塘的人，离赖家垅不过两里多地，他们所说的，大概就是此人。我听了他们的话，当时却并未在意。到了年底，雕花活没有做完，留着明年再做，我就辞别了赖家,回家过年。

光绪十五年(己丑，1889)，我二十七岁。过了年，我仍到赖家垅去做活。有一天,我正在雕花,赖家的人来叫我,说:寿三爷来了,要见见你!”我想:这有什么事呢?”但又不能不去。见了寿三爷,我照家乡规矩,叫了他一声‘三相公”。寿三爷倒也挺客气,对我说:我是常到你们杏子坞去的,你的邻居马家,是我的亲戚,常说起你:人很聪明,又能用功。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,从没有见到过,今天在这里遇上了,我也看到你的画了,很可以造就!”又问我：“家里有什么人?读过书没有?”还问我:愿不愿再读读书,学学

画 ?”我一一的回答,最后说“: 读书学画,我是很愿意,只是家里穷,书也读不起,画也学不起。’寿三爷说“: 那怕什么 ?你要有志气,可以一面读书学画,一面靠卖画养家,也能对付得过去。你如愿意的话,等这里的活做完了,就到我家来谈谈 !’我看他对我很诚恳,也就答应了。

这位寿三爷,名叫胡自倬,号叫沁园,又号汉槎。性情很慷慨,喜欢交朋友,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,他自己能写汉隶,会画工笔花鸟草虫,做诗也做得很清丽。他家附近,有个藕花池,他的书房就取名‘ 藕花吟馆 ”,时常邀集朋友,在内举行诗会,人家把他比作孔北海,说是“: 座上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。’他们韶塘胡姓,原是有名的财主,但是寿三爷这一房,因为他提倡风雅,素广交游,景况并不太富裕。可见他的人品,确是很高的。我在赖家垅完工之后,回家说了情形,就到韶塘胡家。那天正是他们诗会的日子,到的人很多。寿三爷听说我到了,很高兴,当天就留我同诗会的朋友们一起吃午饭,并介绍我见了他家延聘的教读老夫子。这位老夫子,名叫陈作埙,号叫少蕃,是上田冲的人,学问很好,湘潭的名士。吃饭的时候,寿三爷又问我:“你如愿意读书的话,就拜拜陈老夫子的门吧 !不过你父母知道不知道 ?”我说“: 父母倒也愿意叫我听三相公的话,就是穷…… ’话还没说完,寿三爷拦住了我,说“: 我不是跟你说过,你就卖画养家 !你的画,可以卖出钱来,别担忧 !’我说“: 只怕我岁数大了,来不及。’寿三爷又说“: 你是读过《三字经》的 !苏老泉,二十七,始发愤,读书籍。你今年二十七岁,何不学学苏老泉呢 ?”陈老夫子也接着说“: 你如果愿意读书,我不收你的学俸钱。”同席的人都说:“读书拜陈老夫子,学画拜寿三爷,拜了这两位老师,还怕不能成名 !’我说“: 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,我是感激不尽。”寿三爷说“: 别三相公了 !以后就叫我老师吧 !’当下,就决定了。吃过了午饭,按照老规矩,先拜了孔夫子,我就拜了胡陈二位,做我的老师。

我拜师之后，就在胡家住下，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，给我取了一个名字,单名叫做‘璜”,又取了一个号,叫作‘濒生 ”,因为我住家与白石铺相近,又取了个别号,叫做‘白石山人 ”,预备题画所用。少蕃师对我说“:你来读书,不比小孩子上蒙馆,也不是考秀才赶科举的,画画总要会题诗才好,你就去读《唐诗三百首》吧!这部书,雅俗共赏,从浅的说,入门很容易,从深的说,也可以钻研下去,俗语常说,‘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做诗也会吟’,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诗的一道,本是易学难工,你能专心用功,一定很有成就。常言道,‘有志者,事竟成。’又道,‘天下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’天下事的难不难,就看你的有心没心了!”

从那天起,我就读《唐诗三百首》了。我小时候读过《千家诗》,几乎全部都能背出来,读了《唐诗三百首》,上口就好像见到了老朋友,读得很有味。只是我识字不多,有很多生字,不容易记熟,我想起一个笨法子,用同音的字,注在书页下端的后面,温习的时候,一看就认得了。这种法子,我们家乡叫做‘白眼字 ”,初上学的人,常有这么用的。过了两个来月,少蕃师问我“:读熟几首了 ?”我说:“差不多都读熟了。”他有些不信,随意抽问了几首,我都一字不遗的背了出来。他说“:你的天分,真了不起!”实在说来,是他的教法好,讲了读,读了背,背了写,循序而进,所以读熟一首,就明白一首的意思,这样既不会忘掉,又懂得好处在哪里。《唐诗三百首》读完之后,接着读了《孟子》。少蕃师又叫我在闲暇时,看看《聊斋志异》一类的小说，还时常给我讲讲唐宋八家的古文。我觉得这样的读书，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了。

我跟陈少蕃老师读书的同时，又跟胡沁园老师学画，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。沁园师常对我说“:石要瘦,树要曲,鸟要活,手要熟。立意、布局,用笔、设色,式式要有法度,处处要合规矩,才能画成一幅好画。 ”他把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，叫我仔细观摹。又介绍了一位谭荔生,叫我跟他学画山水,这位谭先生,单名一个‘溥’字,别号

瓮塘居士，是他的朋友。我常常画了画，拿给沁园师看，他都给我题上了诗。他还对我说“：你学学做诗吧 !我会画，不会做诗，总是美中不足。”那时正是三月天气，藕花吟馆前面，牡丹盛开。沁园师约集诗会同人，赏花赋诗，他也叫我加入。我放大了胆子，做了一首七绝，交了上去，恐怕做得太不像样，给人笑话，心里有些跳动。沁园师看了，却面带笑容，点着头说“：做得还不错 !有寄托。”说着，又念道“：莫羡牡丹称富贵，却输梨橘有余甘。这两句不但意思好，十三谭的甘字韵，也押得很稳。”说得很多诗友都围拢上来，大家看了，都说“：濒生是有聪明笔路的，别看他根基差，却有性灵。诗有别才，一点儿不错 !”

这一炮，居然放响，是我料想不到的。从此，我摸索得了做诗的诀窍，常常做了，向两位老师请教。当时常在一起的，除了姓胡的几个人，其余都是胡家的亲戚，一共有十几个人，只有我一人，不是胡家的亲故，他们倒都跟我处得很好。他们大部分是财主人家的子弟，至不济的也是小康之家，比我的家景，总要强上十倍。他们并不嫌我出身寒微，一点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，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
那年七月十一日，春君生了个男孩，这是我们的长子，取名良元，号叫伯邦，又号子贞。我在胡家，读书学画，有吃有住，心境安适得很，眼界也广阔多了，只是想起了家里的光景，决不能像在胡家认识的一般朋友的胸无牵挂。干雕花手艺，本是很费事的，每一件总得雕上好多日子，把身子困住了，别的事就不能再做。画画却不一定有什么限制，可以自由自在地，有闲暇就画，没闲暇就罢，画起来，也比雕花省事得多。就觉得沁园所说的‘ 卖画养家 ’这句话，确实是既方便，又实惠。

那时照相还没盛行，画像这一行手艺，生意是很好的。画像，我们家乡叫做描容，是描画人的容貌的意思。有钱的人，在生前总要画几幅小照玩玩，死了也要画一幅遗容，留作纪念。我从萧芗咳

师傅和文少可那里，学会了这行手艺，还没有给人画过，听说画像的收入，比画别的来得多，就想开始干这一行了。沁园师知道我这个意思，到处给我吹嘘，韶塘附近一带的人，都来请我去画，一开始，生意就很不错。每画一个像，他们送我二两银子，价码不算太少，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，往往在画像之外，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、袖套、鞋样之类。甚至叫我画幅中堂，画堂屏条，算是白饶。好在这些东西，我随便画上几笔，倒也并不十分费事。我们湘潭风俗，新丧之家，妇女们穿的孝衣，都把袖头翻起，画上些花样，算做装饰。这种零碎玩艺儿，更是画遗容时必须附带着画的，我也总是照办了。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，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，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，人家都说，这是我的一项绝技。人家叫我画细的，送我四两银子，从此就作为定例。我觉得画像挣的钱，比雕花多，而且还省事，因此，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，改了行，专做画匠了。

## 诗画篆刻渐渐成名（1890—1901）

光绪十六年（庚寅，1890），我二十八岁。十七年（辛卯，1891），我二十九岁。十八年（壬辰，1892），我三十岁。十九岁（癸巳，1893），我三十一岁。二十年（甲午，1894），我三十二岁。这五年，我仍靠着卖画为生，来往于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。在我刚开始画像的时候，家景还是不很宽裕，常常为了灯盏缺油，一家子摸黑上床。有位朋友黎丹，号叫雨民，是沁园师的外甥，到我家来看我，留他住下，夜无油灯，烧了松枝，和他谈诗。另一位朋友王训，也是沁园师的外甥，号叫仲言，他的家里有一部白香山《长庆集》，我借了来，白天没有闲暇，只有晚上回了家，才能阅读，也因家里没有灯油，烧了松柴，借着柴火的光亮，对付着把它读完。后来我到了七十岁时，想起了这件事，做过一首《往事示儿辈》的诗，说：

村书无角宿缘迟，廿七年华始有师，
灯盏无油何害事，自烧松火读唐诗。

没有读书的环境,偏有读书的嗜好,你说,穷人读一点书,容易不容易。

我三十岁以后，画像画了几年，附近百来里地的范围以内，我差不多跑遍了东西南北。乡里的人，都知道芝木匠改行做了画匠，说我画的画，比雕的花还好。生意越做越多，收入也越来越丰，家里靠我这门手艺，光景就有了转机，母亲紧皱了半辈子的眉毛，到这时才慢慢的放开了。祖母也笑着对我说：“阿芝！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枝笔,从前我说过,哪见文章锅里煮,现在我看见你的画,却在锅里煮了!'我知道祖母是说的高兴话,就画了几幅画,挂在屋里,又写了一张横幅,题了‘甑屋’两个大字,意思是“可以吃得饱啦,不致于像以前锅里空空的了。”

那时我已并不专搞画像，山水人物，花鸟草虫，人家叫我画的很多，送我的钱，也不比画像少。尤其是仕女，几乎三天两朝有人要我画的，我常给他们画些西施、洛神之类。也有人点景要画细致的,像文姬归汉、木兰从军等等,他们都说我画得很美,开玩笑似的叫我‘齐美人”。老实说,我那时画的美人,论笔法,并不十分高明,不过乡人光知道表面好看，家乡又没有比我画得好的人，我就算独步一时了。常言道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。'他们这样抬举我,说起来，真是惭愧得很。但是，也有一批势利鬼，看不起我是木匠出身,画是要我画了,却不要题款。好像是画是风雅的东西,我是算不得斯文中人，不是斯文人，不配题风雅画。我明白他们的意思,觉得很可笑,本来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,只是为了挣钱吃饭,也就不去计较这些。他们既不少给我钱，题不题款，我倒并不在意。

我们家乡，向来是没有裱画铺的，只有几个会裱画的人，在四乡各处，来来往往，应活做工，萧芗陔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人。我在沁园师家读书的时候，沁园师曾把萧师傅请到家里，一方面叫他裱

画，一方面叫公子仙逋，跟他学做这门手艺。特地匀出了三间大厅,屋内中间,放着一张尺码很长很大的红漆桌子,四壁墙上,钉着平整干净的木板路子,所有轴干、轴头、别子、绫绢、丝绦、宣纸、以及排笔、浆糊之类，置备得齐齐备备，应有尽有。沁园师对我说：“濒生,你也可以学学!你是一个画家,学会了,装裱自己的东西，就透着方便些。给人家做做活，也可以作为副业谋生。”沁园师处处为我打算，真是无微不至。我也觉得他的话，很有道理，就同仙逋,跟着萧师傅,从托纸到上轴,一层一层的手续,都学会了。

乡里裱画,全绫挖嵌的很少,讲究的,也不过“绫镶圈”“绫镶边”而已,普通的都是纸裱。我反复琢磨,认为不论绫裱纸裱,关键全在托纸,托得匀整平贴,挂起来,才不会有卷边抽缩、弯腰驼背等毛病。比较难的，是旧画揭裱。揭要揭得原件不伤分毫，裱要裱得清新悦目，遇有残破的地方，更要补得天衣无缝。一般裱画，只会裱新的,不会揭裱旧画,萧师傅是个全才,裱新画是小试其技,揭裱旧画是他的拿手本领。我跟他学了不少日子，把揭裱旧画的手艺也学会了。

我三十二岁那年,2 月 21 日，春君又生了个男孩，这是我们的次子，取名良黼，号叫子仁。我自从在沁园师家读书以后，由于沁园师的吹嘘，朋友们的介绍，认识的人，渐渐地多了。住在长塘的黎松安,名培銮,又名德恂,是黎雨民的本家。那年春天,松安请我去画他父亲的遗像，他父亲是上年故去的。王仲言在他们家教家馆，彼此都是熟人，我就在松安家住了好多时候。长塘在罗山的山脚下,杉溪的后面,溪水从白竹坳来,风景很幽美。那时,松安的祖父还在世，他老先生是会画几笔山水的，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画，都拿了出来给我看，我就临摹了几幅。朋友们知道我和王仲言都在黎松安家，他们常来相叙，仲言发起组织了一个诗会，约定集会地点，在白泉棠花村罗真吾、醒吾弟兄家里。真吾名天用，他的弟弟醒吾名天觉,是沁园师的侄婿,我们时常在一起,都是很相好的。

讲实在的话,他们的书底子,都比我强得多,做诗的功夫,也比我深得多。不过那时是科举时代，他们多少有点弋取功名的心理，试场里用得着的是试帖诗，他们为了应试起见，都对试帖诗有相当研究，而且都曾下了苦功揣摹过的。试帖诗虽是工稳妥贴，又要圆转得体，做起来确是不容易，但过于拘泥板滞，一点儿不见生气。我是反对死板板无生气的东西的，做诗讲究性灵，不愿意像小脚女人似的扭捏作态。因此，各有所长，也就各做一派。他们能用典故,讲究声律,这是我比不上的,若说做些陶写性情、歌咏自然的句子，他们也不一定比我好了。

我们的诗会,起初本是四五个人,随时集在一起,谈诗论文,兼及字画篆刻,音乐歌唱,倒也兴趣很浓,只是没有一定日期,也没有一定规程。到了夏天，经过大家讨论，正式组成了一个诗社，借了五龙山的大杰寺内几间房子，作为社址，就取名为龙山诗社。五龙山在中路铺白泉的北边，离罗真吾、醒吾弟兄所住的棠花村很近。大杰寺是明朝就有的，里边有很多银杏树，地方清静幽雅，是最适宜避暑的地方。诗社的主干,除了我和王仲言、罗真吾、醒吾弟兄，还有陈茯根、谭子荃、胡立三,一共是七个人,人家称我们为龙山七子。陈茯根名节，板桥人，谭子荃是罗真吾的内兄，胡立三是沁园师的侄子，都是常常见面的好朋友。他们推举我做社长，我怎么敢当呢？他们是世家子弟，学问又比我强，叫我去当头儿，好像是存心跟我开玩笑,我是坚辞不干。王仲言对我说“:濒生,你固执了！我们是论齿,七人中,年纪是你最大,你不当,是谁当了好呢 我们都是熟人,社长不过应个名而已,你还客气什么 ?他们都附和王仲言的话，说我客气得无此必要。我没法推辞，只得应允了。

社外的诗友,却也很多,常常来的,有黎松安、黎薇荪、黎雨民、黄伯魁、胡石庵、吴刚存等诸人，也都是我们向来极相熟的。只有一个名叫张登寿，号叫仲陶的，是我新认识的。这位张仲陶 ,出身跟我一样寒微，年轻时学过铁匠，也因自己发愤用功，读书读得很

有一点成就，拜了我们湘谭的大名士王湘绮先生做老师，经学根柢很深，诗也做得非常工稳。乡里的一批势利鬼，背地里仍有叫他张铁匠的。这和他们在我改行以后，依旧叫我芝木匠，是一样轻视的意思。我跟他，都是学过手艺的人，一见面就很亲热，交成了知己朋友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乙未，1895），我三十三岁。黎松安家里，也组成了一个诗社。松安住在长塘，对面一里来地，有座罗山，俗称罗网山，因此，取名为“罗山诗社”。我们龙山诗社的主干七人，和其他社外诗友，也都加入，时常去做诗应课。两山相隔，有五十来里地，我们跑来跑去，并不嫌着路远。那年，我们家乡遭逢了很严重的旱灾，田里的庄稼，都枯焦得不成样子，秋收是没有把握的了，乡里的饥民，就一群一群的到有钱人家去吃饭。我们家乡的富裕人家，家里都有谷仓，存着许多稻谷，年年吃掉了旧的，再存新的，永远是满满的仓，这是古人所说积谷防饥的意思。可是富裕人家，究属少数，大多数的人们，平日糊得上嘴，已不容易，哪有力量积存稻谷，逢到灾荒，就没有饭吃，为了活命，只有去吃富户的一法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排着队伍，鱼贯而进，倒也很守秩序，不是乱抢乱撞的。到了富户家里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，打米煮饭，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，吃了几顿饱饭，又往别的地方，换个人家去吃。乡里人称他们为“吃排饭”。但是他们一群去了，另一群又来，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，富户存的稻谷，归根结蒂，虽没吃光，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。我们这些诗友，恰巧此时陆续的来到黎松安家，本是为了罗山诗社来的，附近的人，不知底细，却造了许多谣言，说是长塘黎家，存谷太多，连一批破靴党（意指不安份的读书人）都来吃排饭了。

那时，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寺内迁出，迁到南泉冲黎雨民的家里。我往来于龙山、罗山两诗社，他们都十分欢迎。这其间另有一个原因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们要我造花笺。我们家乡，是买不

到花笺的，花笺是家乡土话，就是写诗的诗笺。两个诗社的社友，都是少年爱漂亮,认为做成了诗,写的是白纸,或是普通的信笺,没有写在花笺上，觉得是一件憾事，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，他们就跟我商量了。我当然是义不容辞，立刻就动手去做，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,裁八行信笺大小,在晚上灯光之下,一张一张的画上几笔，有山水,也有花鸟,也有草虫,也有鱼虾之类,着上了淡淡的颜色，倒也雅致得很。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，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,分给社友们写用,就足够的了。王仲言常常对社友说:"这些花笺,是濒生辛辛苦苦造成的,我们写诗的时候,一定要仔细地用，不要写错。随便糟蹋了，非但是怪可惜的，也对不起濒生熬夜的辛苦！"

说起这花笺，另有一段故事：在前几年，我自知文理还不甚通顺，不敢和朋友通信，黎雨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，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，逼着我给他写信，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，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。不过雨民送我的，是写信用的信笺，不是写诗用的花笺。为了谈起造花笺的事，我就想起黎雨民送我信笺的事来了。

光绪二十二年(丙申,1896)，我三十四岁。我起初写字，学的是馆阁体,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,看了沁园、少蕃两位老师,写的都是道光年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，我也跟着他们学了。又因诗友们,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,兼会刻印章的,我想学刻印章，必须先会写字，因之我在闲暇时候，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。前两年,我在人家画像,遇上了一个从长沙来的人,号称篆刻名家,求他刻印的人很多，我也拿了一方寿山石，请他给我刻个名章。隔了几天,我去问他刻好了没有?他把石头还了给我,说:"磨磨平,再拿来刻!"我看这块寿山石,光滑平整,并没有什么该磨的地方,既是他这么说，我只好磨了再拿去。他看也没看，随手搁在一边。又过了几天,再去问他,仍旧把石头扔还给我,说:"没有平,拿回去再磨磨!"我看他倨傲得厉害,好像看不起我这块寿山石,也许连我这个